



# 古文辞类纂

【清】姚 鼐 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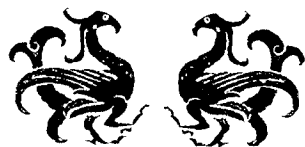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书是我国近 200 年来最著名的大型古文选本。75 卷琼瑶佳什，715 篇锦绣文章。上自先秦两汉，下迄明清，鸿文巨制，短篇小札，包罗万象，珠玉无遗。风格或整饬典重，或清丽秀逸，摇曳多姿，五彩缤纷。考据、辞章并重，阳刚、阴柔兼美。堪称阅读、欣赏、研究中国古代散文、辞赋的最佳读本。

I · 1166 定价:37.30 元  
ISBN 7-5325-2294-6



9 787532 522941 >



# 古文辞类纂

【清】姚 鼐 纂集

胡士明 李祚唐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文辞类纂

〔清〕姚 鼐 纂集

胡士明 李祚唐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6.125 字数 698,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5-2294-6

---

I·1166 定价：37.30 元

## 前 言

中国古代的散文，如同中国古代诗歌一样，源远流长，作品丰富，一般人要遍读所有作品，几乎无此精力，而且也没有必要，于是就有选本的产生。由于读者的需要，这类选本也就日见其多。但真正称得上名家名选，分门别类溯源探流、申明义法的，当以清代乾隆年间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为首选。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又字梦谷，以书斋名惜抱轩，学者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历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刑部郎中、四库馆纂修官。曾主讲扬州梅花、安庆敬敷、歙县紫阳、南京鍾山等书院。通经学，善古文辞，为桐城派最主要的作家和理论家。著述有《惜抱轩诗文集》、《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除《古文辞类纂》外，另选有《五七言今体诗钞》、《唐人绝句诗钞》等书。

《古文辞类纂》初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后三十多年中，姚氏本人又随时修订，至晚年才定稿。全书七十五卷，分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十三类。选文七百十五篇，上自先秦、两汉，下迄明、清，而以唐、宋八家为主，八家之后，明取归有光，清取方苞、刘大櫆，以继八家之绪，表明了姚鼐所推崇的古文传统。

《古文辞类纂》卷首有姚氏《序目》一篇，论述文体分类、各类文体的特点、功用以及各文体的选录标准。最后总结学习为文的方法，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之说，神、理、气、味即文

章的精神、脉理、气势、韵味，属于“文之精”；格、律、声、色即文章的篇章结构、句法、音节、辞采，属于“文之粗”，并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为文应由粗到精、由表及里、遗貌取神，达到“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境界，不能停留于形式的模拟。所以他特别肯定韩愈学古而善于变化，无迹可寻，对扬雄、柳宗元效法古人而形迹过似略有微辞。这篇《序目》，可以看作是姚鼐重要的文体论和文论，其中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之诀，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兼及阳刚、阴柔之美的论说一样，构成了桐城派散文理论的重要部分。

作为一部巨型选本，《古文辞类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文体分类。自《昭明文选》以来，文体分类大多流于繁琐，有的分到数十类之多，往往既无理论意义，又无实用价值。即以《文选》而言，选录先秦至梁各体诗文，分为三十八类，辞赋类中又分赋、骚、七、对问、设论、辞、符命、连珠等名目，其中赋再分十五小类，故姚鼐讥评说：“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古文辞类纂序目》）因此他编《古文辞类纂》时，有意要纠历来文体分类之弊，根据文章的功用，将各体古文约之为十三类，显然比较合理简明，因而为后来的编者广泛接受，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的《新古文辞类纂》、吴曾祺的《涵芬楼古今文钞》等，其分类或与之相近，或径依姚氏之例。这是姚鼐对文体分类学的一个贡献。

二是选材。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目的是为学习古文的人提供一种作文门径，选材上除了有有意要标榜自己的文统外，同时还表现了一个选家的卓识。唐、宋散文是中国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佳作如林，极一时之盛，历代有眼光的选家，无不从中披沙拣金。《古文辞类纂》选文主于唐、宋，从两朝代表作家八家之中，选取四百余篇，占了整个选本篇幅的半数以上。八家之中，又特重韩愈，选其文一百三十篇，为八家之首。这表明姚鼐对唐、宋

散文特别是八家之文成就的高度推崇,也是对韩愈学古而能遗貌取神及其为文气势雄健的阳刚之美的特殊欣赏。《古文辞类纂》还特立辞赋类,选录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一大批作家的相当数量的辞赋,并指出“《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楚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从中可见姚鼐对散文创作中音韵、辞采等艺术手段的重视和对艺术虚构的肯定。对于明代归有光的文章,方苞曾批评为内容贫乏,文辞近俚而伤于繁,姚鼐却认为归文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深得《史记》笔法,录其文三十篇,超过了八家中的曾巩、苏洵、苏轼,几与柳宗元相等,其识力显然为方苞所不及。在《古文辞类纂》所选录的七百余篇作品中,名篇佳作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所谓文因书传,是指某文因某书而得以保存,或某文因某书而得到广泛传播,不过这些名篇佳作,倒并不是沾了《古文辞类纂》的光,它们能够历久长新,为读者百读不厌,自有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姚鼐卓越的文学眼光。

作为旧时代的一部总集,《古文辞类纂》自然也免不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如“古文辞”名义的确定问题,入选作品是否得当的问题,取材的宽窄问题,圈点评注是否正确的问题等等,前人多有论及,这里不作复述。而且,这些问题,也仅是各家见仁见智之说,不能据以为准。要之,这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大型古文选本,它对于今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遗产、考察文章源流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文辞类纂》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至嘉庆末年,始有姚鼐弟子康绍庸据李兆洛所藏抄本刊刻,世称“康本”。康氏所刊,为姚氏乾隆年间订本,七十四卷,有姚氏本人的评注和圈点。康本问世后,曾被多次翻刻,故流传较广。道光五年(1825),又有姚鼐门人吴启昌取所录姚氏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订本,与管同、梅曾亮、刘钦雋校后开刻,世称“吴本”。此本原无方苞、刘大櫆之作,按姚氏

意见刻入,又悉去原有圈点。康本第二十二卷,吴本析为两卷,故全书为七十五卷,篇目与康本也稍异。康、吴两种本子,虽均据姚氏订本,但仍各有脱讹,均未精善。光绪年间,滁州李承渊得姚鼐晚年传其幼子姚雉之圈点本,又取康、吴二本详勘一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刻,历时五载,于光绪三十二年秋刻成,因李氏寓所名“求要堂”,世称“求要堂本”。

我们这次校点整理,即以李氏求要堂本为底本,参以康本、吴本,遇有疑误处,据通行各篇所出原书订正。为撙节篇幅,不出校记,同时删除姚氏的评注。凡古体、异体字,一律改为今体、正体字,通假字一般不改。为便于阅读,各篇据文意酌予分段。书后原有李氏《校勘记》若干,今删去。书中题下及正文中的圈点,因排印不便,也一律删去。校点整理或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校点者

1997.5.12



## 校刊古文辞类纂后序

桐城姚姬传先生所为《古文辞类纂》，早已风行海内，学者多有其书矣。顾先生于此书，初纂于乾隆四十四年，时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乾嘉之间学者所见，大抵皆传钞之本。至嘉庆季年，先生门人兴县康中丞绍镛始刊于粤东；道光五年，江宁吴处士启昌复刊于金陵。然康氏所刊，乃先生乾隆间订本，后二三十年，先生时加审订，详为评注，而圈点亦与康本互有异同。盖先生之学与年俱进，晚年造诣益深，其衡鉴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吴氏刊本，系先生晚年主讲锺山书院时所授，且命付梓时去其圈点。道光以来，外省重刊，大抵据康氏之本，而吴本仅同治间楚南杨氏校刊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间学者虽多读此书，容有未知康刊为先生中年订本，吴刊为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辞类纂》，“纂”字本《汉书·艺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来，误刊为“古文辞类纂”，至今《古文辞类纂》之名大著，鲜有知为“纂”字本义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时有脱讹，不如吴本经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异之、刘殊庭诸君讎校之精。然康氏刊本，实出先生高弟李申耆，李君又实司校刊之役者也。承渊少读此书，先后得康、吴两本，互为校勘，乃知各有脱讹，均未精善，所谓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者也。不知为姚先生原本所据尚非各种精本，未及详勘，抑亦诸君子承校此书，不免以轻心掉之者也。

二十年来，承渊凡见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书旧槧有关此书校勘者，随时用朱墨笔注于上下方，积久颇觉近完美。又桐城老辈，

如方望溪侍郎代果亲王所为《古文约选》，刘海峰学博所为《唐宋八家文约选》，均用圈点，学者称之。姚先生承方、刘二公之业，亦尝示学者前辈批点可资启发，即所纂此书，不但评注数有增加，而圈点亦随时厘订，惜往年无由得见耳。顷与先生乡人兰陵逸叟相往还，偶谈此书，逸叟即出行笥所录姚先生晚年圈点本见示。大喜过望，询所由来，乃得诸其乡先生苏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即得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雒家藏原本而录之者也。

承渊早岁浮家久离乡土，念吾滁州僻处江淮之间，四方书贾足迹罕至，乡塾所读不过俗行《古文析义》、《观止》等本，不足启发后学神智，乃假逸叟藏本，录其圈点于所校本上，付诸手民，刊于家塾，庶几吾滁可家有其书，不为俗本所囿矣。至刊版改从毛氏汲古阁所刊古书格式，字画力求精审。又康刻于姚先生所录汉文，时用《汉书》古字，今考姚先生所录汉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参用《史记》、《文选》及司马氏《资治通鉴》、真氏《文章正宗》等书字句者，今亦酌为变通：凡一文参用各本者，则均用通行宋字；惟单据《汉书》本文，则仍遵用《汉书》本字，以存其真。惟姚先生定本，虽有圈点，而无句读，承渊伏念穷乡晚进所读古文，不惟藉前人圈点获知古人精义所在，即句读尤不可轻忽，句读不明，精义何有？昔班氏《汉书》初出，当时如大儒马融，至执贄于曹大家，请授句读；韩昌黎《上兵部李侍郎书》，亦有“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覆乎句读”之论。我朝乾隆三年冬诏刊《十三经》、《二十一史》，时方侍郎苞曾上《重刊经史事宜札子》，中一条有“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当时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书，既精且博。论者以汉唐文字，句法古奥，多有难明，承渊以为唐宋以来洋洋大篇，句读亦未易全晓，矧穷乡晚进，读书不多，顿见此书，旨义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贻

误来学，匪为浅鲜。今承渊窃取方公之义，每读一篇，精思博考，句点分明，虽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无失。昔颜秘监之注《汉书》，胡景参之注《资治通鉴》，间有破句，有失两书本旨者。以二公之学识通博，精神措注，尚未能毫发无憾，而况后人学识精神远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执己见，勤学好问，一有会悟，随时改正而已。惟承渊所读，间有句读与前人有异，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读能补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删改康、吴原书字句恐滋后人所疑者，容当别为札记一编，附于本书之后，不过使穷乡晚进增广见闻，便于诵习而已，非敢云能补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吴之本校刊虽未精善，而两序实能发明姚先生所纂大旨，今仍附录之，俾读者详悉，而承渊更不敢再赞一辞焉。

光绪二十七年，岁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后学李承渊书于上海求要堂寓。

## 康刻古文辞类纂后序

余抚粤东之明年，儿子兆奎师武进李君兆洛申耆来，语次及桐城姚姬传先生《古文辞类纂》一书在其家。余尝受学于先生，凡语弟子，未尝不以此书；非有疾病，未尝不订此书；盖先生之于是亦勤矣！顾未有刻，因发书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后曰：

先生博通坟籍，学达古今，尤善文章，然铭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于道，生平未尝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馆改刑部，历官郎中，典试山东、湖南。当国家平治之际，而已无言责，于廷臣集议，尝引大体，无所附丽。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学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门，先生不应，谢病归。归后数年，客扬州，有少年从问古文学法者，于是集次秦、汉以来至方望溪、刘海峰之作，类而论之，总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独勤勤于是哉？盖以为古文之衰，且七百年，本朝作者以十数，然推方望溪、刘海峰。望溪之言曰：学行继程、朱而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得其正。昔之君子，学古先圣王之书，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赅备，然后形而为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浑合元气，细凑无伦。其于事也，资之无穷，用之不竭，如饮食水火之不可释者，文之至盛也。次则镜治乱之体，救当世之急，言出乎己，不必古人之尽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于我也。若夫不遍不该，驰骋事物，纵丽可喜，不失尺寸，则所谓小言者矣。秦、汉、唐、宋，文章闳隳，后世莫及，亦比于其次而已。然犹代不数人，人不数篇，盖难也如是。以至于今，不知古人之纯备，不究修辞之体要，而决裂规矩，沈酣淫波者，往往而然。后生小子，

循而习之，则古文之学，将不可复振已乎。不有开之，孰能起之？开之以言，不若导之以道。导而不然，导而不当，则亦俟焉以语来者。呜呼！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恒，乃得与于作者之林矣。

先生为先荣禄庚午同年，伯父茂园先生之友，余从宦金陵，侍先生于锺山讲席。先生曰：为学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学勤则所得固，品端则行不移，而知致焉，气充焉。所守于内者如此，其施于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轩诗文集》二十六卷、《九经说》十七卷、《三传补注》一卷、《惜抱轩笔记》八卷，皆已刻。《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

康绍镛撰。

## 吴刻古文辞类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启昌任为刊刻，请其本而录藏焉。未几，先生捐馆舍，启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为也。后数年，兴县康抚军刻诸粤东，其本遂流布海内。启昌得之，以校所录藏，其间乃不能无稍异。盖先生于是书，应时更定，没而后已。康公所见，犹是十馀年前之本，故不同也。

夫文辞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华》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骈丽绮靡之作，知文章者，盖摈弃焉。南宋以后，吕伯恭、真希元诸君，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迄于有明，唐应德、茅顺甫文字之见，实胜前人，然所选或止科目时文之什。自兹以降，盖无论矣。且夫无离朱之明，则不能穷青黑；无夔、旷之聪，则不能正宫羽；无孔、孟之贤圣，则不能等差舜、武，品题夷、惠。文辞者，道之馀；纂文辞者，抑教之末也。顾非才足于素，学溢于中，见之明而知之的，则亦何以通古今，穷正变，论昔人，而毫厘无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为也；执一得而言之，狭而不足为也。自梁以来，纂文辞者日众，而至今讫无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气节道德，海内所知，兹不具论。其文格则授之刘学博，而学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学识深远，所独得者，方、刘不能逮也。蚤休官，毫耄嗜学不倦，是以所纂文辞，上自秦汉，下至于今，搜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使夫读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砾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玑，而泥沙靡不辨。呜呼，至矣！无以加矣！纂文辞者，至是而止矣。启昌

于先生，既不敢负已诺，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见未备，遂取乡所录藏本，与同门管异之同、梅伯言曾亮、刘殊庭钦同事雠校，阅二年而书成。是本也，旧无方、刘之作，而别本有之，今依别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旧有批抹圈点，近乎时艺，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

道光五年秋八月，受业门人江宁吴启昌谨记。

## 目 录

前言·····	1
校刊古文辞类纂后序·····	1
康刻古文辞类纂后序·····	1
吴刻古文辞类纂序·····	1
古文辞类纂序目·····	1
正文·····	1



## 古文辞类纂序目

鼎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薑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语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 卷 一

贾生过秦论上 .....	1	贾生过秦论下 .....	3
贾生过秦论中 .....	2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 .....	5